

漢言

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通訊

二〇一七年 春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道風山路33號 電話：(852) 2694-6868 傳真：(852) 2601-6977
網址：<http://www.iscs.org.hk> 電子郵件：info@iscs.org.hk

文章分享

全球化的變局與漢語神學的應對

趙林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本所學術委員

近年來世界發展態勢發生了耐人尋味的變化：一方面是曾經積極推進全球化歷程的西方大國日益走向保守主義，英國公投退出歐盟，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明確表達了反全球化的立場，歐洲的一些國家（如法國、意大利等）也表現出強烈的孤立傾向；另一方面則是中國迅速崛起，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試圖通過「一帶一路」戰略來引領全球化的新方向。自從葡萄牙、西班牙率先開啟大航海運動以來，西方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通過海洋走向世界，將廣大的美洲、非洲、澳洲和亞洲地區納入到由西方文明主導的全球化歷程中。全球化最初是一個由西方國家通過殖民途徑而推動的現代化轉型過程，其實質就是通過武力征服或和平傳播的方式，將西方現代文明的政治、經濟、文化成果嫁接到世界的所在地區。然而隨着全球殖民體系的瓦解和東方國家（如中國、印度等）的崛起，全球化歷程的西化色彩逐漸消褪，西方大國的領導地位也正在受到有力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英、美等國開始做出反全球化的戰略調整，而中國則義不容辭地準備接過引領全球化歷程的接力棒。

這種微妙的國際戰略變化使得未來的世界文化走



向也變得撲朔迷離，文化全球化進程或將面臨着本土文化復興的更加強有力的挑戰，從而也對中國基督教運動和漢語神學的未來發展前景提出了現實的拷問。縱觀基督教的發展歷程，在二千年時間裏發生了極其複雜的文化變異。西元一世紀初基督教從東方的猶太教母體中脫穎而出，開始向西方的希臘羅馬世界滲透，通過數百年時間完成了雙向的文化變異過程：一方面是希臘羅馬世界的基督教化（《米蘭敕令》以及其後的基督教國教化），另一方面則是基督教的希臘化（希臘正教）和羅馬化（羅馬公教）。正是這個雙向的文化變異過程使得基督教與西方文化形成了水乳交融的關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西方宗教。西羅馬帝國崩潰後，基督教又開始與北方的日爾曼世界進行文化融合。從日爾曼民族的基督教化（日爾曼各部族對羅馬公教的皈依）到基督教的日爾曼化（宗教改革運動），在經歷了漫長而艱難的文化磨合之後，一種具有日爾曼特色的基督教形態——基督新教——應運而生，並且對西方社會的現代轉型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以後的全球化歷程中，基督教信仰又伴隨着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一同擴展到歐洲以外的地區，在不同的社會土壤中結出了不同的文化果實，如美國的公民宗教、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韓國的民眾神學等，再一次實現了基督教信仰與本土文化的雙向變異過程。

自從利瑪竇等人來到中國內地傳播上帝福音開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相遇已經有四百多年歷史。十九世紀初馬禮遜把新教信仰引入中國後，基督教更是借助強勢的西方文明後盾在中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

宣導儒耶對話的深度互學模式

唐文明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本所二〇一六年度訪問學人

在迄今為止的儒耶對話中，基督教一方處於積極、主動的地位，這當然是因為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才催生了儒耶對話。於是我們也不難理解，傳教模式（missionary model）是儒耶對話的一個最為常見的模式。



¹傳教模式可以涵納多種不同的類型，這是無需贅言的。以理查·尼布爾（H. Richard Niebuhr）對基督與文化之關係的類型刻畫來說，即使是背反和拒絕的類型，也可能以對話的形式呈現出來，更不用說認同、綜合和改造的類型，往往構成對話的主導方向。傳教模式的缺點是顯而易見的：由於過分注重策略且難以真正同情地理解對方，所以往往習慣於揀拾一些有利於自己但未經深思的看法而草率立論。

儒耶對話的第二種類型我稱之為承認模式（recognizing model）。顧名思義，在承認模式中，對話的目的是為了達到相互之間的平等承認，所以，參與者往往是一些比較開放的信仰者（包括個人和團體），也不乏一些沒有信仰承諾而持啟蒙主義立場的學者。²在承認模式的背後往往是出於理性考量的宗教多元論主張，這一點或許能夠說明這一模式的關切和意義，並不在於歸信或改宗，而在於尋求共識，以期和平共處。與傳教模式背後的教會主導不同，承認模式的對話往往以人文學傳統安身於其中的大學、研究院為平台，聚焦於最低限度的交疊共識（如金規則[Golden Rule]），從而不會觸及各教最深邃的思想與精神，無補於各教在新的處境中的內在拓展和思想上的創新。

我要宣導的第三種模式，可稱之為儒耶對話的學習模式（learning model），或者更精確地說是儒耶對話的深度互學模式（a model of deeply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正如傳教、承認都是從實際生活而來的要求，學習也是。換言之，這種模式的可能性條件是儒耶雙方都意識到了向對方學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說得更強烈一些，儒耶雙方都必須感受到彼此之間某種至深的需要，學習的話題才能提到日程上來。反過來說，如果雙方並未感到某種至深的需要，學習模式就無從談起。

在此，我們馬上應該想到，這種至深的需要恰恰緣於因各自的精神魅力而構成的彼此之間的挑戰性關係。這種挑戰性關係表現於個人生活自然構成一種內在的

全球化浪潮雖然有力地把基督教信仰推上了中國文明的堤岸，它卻沒有使中國像美洲和澳洲一樣基督教化，這是因為中國在全球化時代來臨之前已經牢固地確立了以儒家信念為主體的思想價值體系，任何外來文化都不可能從根本上顛覆和取代它。即使是在西化風潮最強勁的二十世紀初葉，當中國的知識精英大力宣導「砸爛孔家店」時，源於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仍然沒有被中國主流社會所認同。1949年以後的一段時間裏，中國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原因與西方世界相決絕，基督教也幾乎遭到了滅頂之災。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積極地投身於國際社會和全球化潮流中，基督教信仰也借助全球化的慣性，一度在中國大地掀起了所謂的「井噴」現象。然而，隨着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提升和建設有中國特色文化的精神覺醒，始終未能蛻下「西化」外皮的基督教再度與日益振興的中國傳統文化處於微妙的張力關係中。

由此可見，數百年來基督教在中國的潮起潮落，既與西方文明主導的全球化浪潮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程度相關，也與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變化以及文化信心相關。時至今日，當西方大國打算從全球化浪潮中抽身而出，中國卻準備接過全球化的時代引擎時，作為中國基督教之理論形態的漢語神學必須順時應變，調整自身的文化定位，以實現從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時代到中國主導的全球化時代的角色轉換。

漢語神學自產生之日起，在自覺推動基督教神學中國化的道路上做出了艱苦的努力，也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漢語神學發展的初始階段，重點放在翻譯西方神學著作和介紹西方神學思想方面，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基督教研究的理論水準和一般基督徒的思想境界。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漢語神學又致力於推進基督教神學與中國傳統思想資源之間的文化溝通，在儒耶對話、佛耶對話、基督教與中國民間宗教對話以及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對話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但是漢語神學的終極目標並不僅僅在於讓基督教神學說漢語，或者與各種漢語文化資源進行求同存異的思想溝通，而是要讓基督教神學真正浸潤到漢語賴以維繫的中國文化土壤中，吸收中國傳統文化資源，把握中國現實發展趨勢，通過深層的文化融合而氤氳化生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基督教思想，就如同印度佛教在中國文化土壤中生長出禪宗、淨土宗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大乘宗派一樣。就此而論，漢語神學已經實現了語言形式的中國化改造，但卻尚未實現精神內涵的中國化轉型，而後者無疑是漢語神學在全球化變局時代的歷史使命。■

精神張力，而當感受到這種挑戰性關係的個人已經明確地傾向於一方或從一開始就立足於一方時，對於對方魅力的最好態度就是學習。但學習並非為了使雙方融合，當然更不是更低層次的承認或寬容，而是通過領會對方魅力來觸發對於自身所服膺之經典的新的理解和新的詮釋。這是立足自身而向對方學習的最好方式。之所以說是深度的，首先是因為這種學習要求對對方魅力的領會必須是深度的，即必須從服膺者的角度且投注生命的熱忱去領會，其次更因為這種學習最終要求學習者回到自身的經典，以他所領會到的、來自對方的精神資源為觸發之機，通過體驗和行動揭示出經典未曾被揭示出的豐富性。

正是這種深度出入對方和最終深度返回自身經典的

模式規定了學習模式的方向和意義：通過對自身經典的重新詮釋將對方的精神吸納進來，也就是，通過深度學習在自身之內消化對方。不消說，儒佛之間的深度互學，這一重大的歷史性事件，是我們在宣導儒耶對話的深度互學模式時所能想到的最重要的歷史經驗。其結果我們已經看到，一方面是佛教的中國化，成就了極有生命力的新宗教，且又傳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是儒教通過這種深度學習而自我更新，變得更加深邃、更加博大。我們自然也可以如此期待儒耶對話的宏大願景。■

1. 我能想到的第一個例子是利瑪竇等耶穌會士開創的儒耶對話模式，而具有士大夫身份的儒教徒也是其中重要的參與者。

2. 如漢斯·昆（Hans Küng）等人宣導的全球倫理計劃，其中也有儒教一方的參與者，可參見劉述先，《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特別報導

同濟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加入「全球公共神學網路」



2016年10月，本所駐國內研究員暨同濟大學哲學系教授謝志斌參加由南非斯德倫堡大學（Stellenbosch University）主辦的「全球公共神學網路」（Global Network for Public Theology）會議，大會主題為「全球在地處境中的民主與社會正義」（Democracy & Social Justice in Glocal Contexts），在會上發表論文〈中國社會的多元問題：儒家與基督教視角的闡釋〉（The Plural Problem in Chinese Society: An Interpretation from Confucian and Christian Perspectives）。在網路成員會議上，謝志斌介紹了同濟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暨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同濟中心開展與公共神學相關的學術研究、活動、出版等方面情況，得到與會成員的一致讚許，同時本所獲准加入「全球公共神學網路」。該網路成立於2007年，旨在提供一個學術合作平台，促進神學與對當代社會公共議題的參與，鼓勵神學與其

他學科的對話與合作，並出版《國際公共神學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Theology*）。該網路目前擁有全球各地大學、神學院的二十多家基督教研究機構成員。同濟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是中國內地第一個加入該網路的成員單位。

《亞洲基督教國際期刊》成立諮詢會議



201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楊熙楠總監應邀出席《亞洲基督教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Christianity*）成立諮詢會議，是次會議由印度知名學人 Felix Wilfred 教授負責召集及主持。楊總監在會上分享《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在中國學界的發展和認受，並結識多位亞洲基督教學人，交換心得，尤其難得是能與台灣資深神學人王伯和教授就兩岸三地的神學發展有深入交流。會前楊總監順道考察傳說中的使徒多馬在喀拉拉邦（Kerala）所建立的七教會。承蒙本所好友美國

加州亞述東方教會的愛華主教（Mar Awa）引介，獲得喀拉拉邦的亞述東方教會（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in India）主教Mar Awgin Kuriakose接待，被安排入住總主教府，並有幸與總主教Metropolitan Mar Aprem Mooken共處起居生活數天。期間Awign主教抽空驅車引路，結伴訪問多所古多馬教會及探訪其他印度教會和神學院。楊總監在主教府生活期間得與兩位主教多次促膝詳談。總主教Aprem學富五車，對印度的亞述東方教會史如數家珍，背誦如流，更曾於2015年至2016年間暫代亞述東方教會牧首之職。

「東正教在中國」展覽和研討會



2016年11月下旬，香港聖彼得聖保羅東正教會主辦了有關「東正教在中國」的展覽和研討會。本所與基督宗教不同派別皆保持友好聯繫，推動大公傳統的研究，故協辦了是次系列活動。「東正教在中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展覽於11月22至28日，假中環聖公會聖約翰座堂的李堂舉行，展出了俄羅斯東正教會來華以來，尤其在香港的不少珍貴相片和資料。開幕禮設有詠唱環節及書展。本所訪問學人、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張百春教授應邀分享，由本所學術主任林子淳教授傳譯。參觀者都深被東正教尤其來華的歷史文化所吸引。

11月25日，本所與承辦的香港城市大學合作，舉行「漢語東正教研究：翻譯與詮釋」的研討會。會議由林子淳教授主持。張百春教授也出席了是次會議，並對各講者作了精簡的回應。參與者來自不同界別，對東正教各方面表現出深度興趣。應邀講員及題目分列如下：

講員	題目
迪·亞歷山大先生 (Aleksandrs Dmitrenko, 城市大學博士候選人)	漢語學界對東正教研究：問題意識
林森先生 (香港聖彼得聖保羅東正教會特聘譯者)	東正教神學、靈修、禮儀術語漢譯的標準
費樂仁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哲宗系教授)	俄帝時代東正教神甫中有世級的漢學家嗎？
Kirill Shkarbul神父 (台灣正教會牧長)	漢語馬克（馬可）福音譯本之缺點及新譯本之需要性

海外訪問學人：何光滬、高師寧出訪京都



2016年10月18日至11月24日，在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資助下，何光滬教授與高師寧教授應邀到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訪問。期間拜訪一神教研究所所長四戶潤彌教授，談及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化關係等問題。11月10日在神學部演講，主題為對於漢語神學的大歷史、大悖論和大趨勢的反思。11月13日在福岡市同華人教會座談中國教會現狀。11月14日在西南學院大學神學部演講，談及何教授親身經歷的當代中國大陸信仰語境，會見須藤伊知郎、加藤壽人以及西南女學院大學徐亦猛等教授。11月16日在東京明治學院大學基督教研究所演講，主題為從個人信仰到漢語神學，再到國家目標的從小到大的「奇蹟」反思；同時會見了徐正敏所長、渡邊祐子教授，以及立命館大學的村上志保和中國訪問學者朱海燕等。在東京還訪問了早稻田大學。在京都也觀察了日本佛教的現狀，發覺其現代做法（例如大型講座）也許是它保持興旺的一個原因。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暑期課程來訪



2016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暑期密集課程學員共五十三人，在本所傑出教授溫偉耀博士的帶領下來訪。楊熙楠總監首先介紹了道風山的歷史及研究所二十多年以來推動漢語基督教研究的工作，隨後由當時訪問學者、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張欣教授為來訪學員主講「柯爾律治的『想象』是否可以作為一種基督教文論資源」的講座，講者與聽眾間有熱烈的討論與交流。

Werner Jeanrond教授來華訪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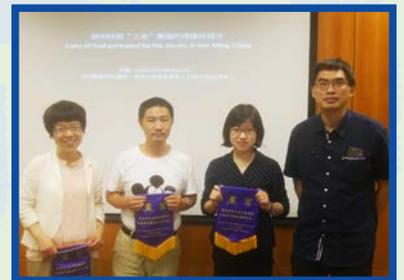


2016年9月間，英國牛津大學聖班納學院院長Werner Jeanrond教授應邀出任本所特邀教授，於香港與北京兩地的大學舉行了一系列學術講座（詳參特邀教授欄目），其中兩講分別於香港中文大學和浸會大學舉行，分別題為「基督教生活和思想中的愛與希

望」和「愛的哲學」，出席者眾多並有熱烈的回應。9月19日，Jeanrond教授來訪道風山，由楊熙楠總監與林子淳教授接待，與他分享基督教研究在國內學界的發展和本所的事工，並商討未來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晚明時期『上帝』圖像的傳播與接受」講座

本所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於2016年9月20日合辦了專題



講座，主題為「晚明時期『上帝』圖像的傳播與接受」，由當時本所訪問學人、南京藝術學院設計學院講師曲藝博士主講，回應嘉賓為同為本所訪問學人、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歐陽肅通副教授。講座討論氣氛熱烈。

Peter Lampe教授來華訪學



2016年10月間，德國海德堡大學新約教授Peter Lampe應邀出任本所特邀教授，於香港兩地多所城市的大學舉行了一系列學術講座（詳參特邀教授欄目）。10月3日早上，Lampe教授來訪道風山，由楊熙楠總監與林子淳教授接待並商討未來的合作。同日下午，本所與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為Lampe教授合辦了專題講座，題目為「猶